

作为现代白话文学源头之一的基督教东传

李丹¹, 张秀宁²

(1. 江苏工业学院, 江苏常州 213164; 2. 浙江大学, 浙江杭州 310028)

摘要: 基督教东传是白话文学运动的重要源头, 基于传教的现实需要, 19世纪早期, 传教士们将《圣经》译为中文, 并创办报刊杂志, 撰写传道小说。由此, 白话文《圣经》的翻译与传播以及传道小说的撰写可以视为后来白话文学运动的先声。这一系列的话语实践对中国现代白话文学的诞生产生了很大影响。

关键词: 基督教; 现代白话文学; 圣经

中图分类号: I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09X(2008)03-0042-06

诸多现代文学史在谈及白话文学源头时, 往往习惯于在中国本土追溯源流, 尤其以胡适的《白话文学史》为代表。在这本开一时之风气的文学史中, 胡适上取汉魏, 下取唐宋^①, 从中梳理打捞白话文学的因子, 泛及中国的散文、叙事诗、佛教翻译文学等, 以求树立白话文学的正宗地位。这种其来有自的历史书写方式很容易给人造成一种印象, 那就是“白话文学”是中国土生土长的产物, 并无外来根基。而且, 胡适本人就明确主张“‘白话文学史’其实是中国文学史”^[1], 这种对本土的强调进一步遮蔽了现代意义上的白话文学产生的根源。事实上, 中国白话文学发展到现在, 至少有三个来源: 一是民间口语; 一是由胡适所梳理和坚持的, 自古以来的书面白话文学传统; 除此之外, 1917年以来的白话文学运动另有一个重要根源, 那就是晚清以来, 肇始于《圣经》翻译与发行及传道书写作的基督教东传, 这一传统一直绵延至今, 可惜极少受到重视。

一、基督教东传中的《圣经》翻译、发行与语言演变

基督教东传肇始于明末清初, 彼时天主教传教士开始进入中国传教, 但一直到17世纪末, 他们都未曾将《圣经》译成中文。直至1700年, 法国传教士巴设 (Rev. J. Basset) 才翻译了一部分《新约》。18世纪末, 耶稣会 (Societas Jesu) 的传教士贺清泰 (Rev. L. de Poirot) 陆续翻译了大部分的《圣经》, 但他的版本并没有正式刊印。巴设所使用的语言已经是中国的白话文, 而贺清泰使用的则是中国的官话, 使用的也是比较俗白的语言。从1806年开始, 英国浸信传教会传教士马西曼 (Joshua Marshman) 与印度加尔各答英印学院的中文教授拉沙 (Joannes Lassar) 开始合作翻译《圣经》, 直到1822年终于将全部《圣经》翻译完毕, 世称马西曼本 (Marshman's Version), 这也是第一本汉译《圣经》。以后浸信传教会在传教过程中大量使用这一译本。虽然马西曼从未履足中国, 但现在看他的翻译, 使用的是一种半生不熟的文言, 如《马可福音》第一章前四句^[2]:

收稿日期: 2007-09-10

作者简介: 李丹(1978-), 男, 吉林通化人, 讲师, 硕士, 研究方向: 中国现代文学

① 其《白话文学史》仅写到唐元和、长庆时期, 但《白话文学史》的前身《国语文学史》已写到了宋代。

耶稣基利士督，神子福音之始也。如预知口书内录云：“夫我差吾使面前以先备尔道也。一者之声呼于野曰：‘尔备主之道，直其路也’”。若翰在野施醮而宣悔罪之醮致得罪之赦。

现代白话文则译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记着说（有古卷无“以赛亚”三字）：‘看哪，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在旷野施洗，传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

到了1823年，在英国新教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和米怜（William Milne）的合作之下，又根据巴设本将《圣经》完全翻译为中文，马礼逊将之命名为《神天圣书》。马礼逊本《圣经》的影响非常大，自1823年刻印，到1837年郭实腊本（Gutzlaff's version）印行，这15年间新教传教士基本都使用他的译本，目前马礼逊本的印刷数量已经不可考，但从1810到1819的10年间，在马礼逊的全本《圣经》尚未发行之前，以单行本形式出版的《新约》、《旧约》合计印行就已经达到10 079册，而这些经书多以偷运的方式被运入中国，广为传布。

在这里不得不提的是马礼逊的翻译原则，马礼逊认为，翻译《圣经》所使用的文体应该既庄重又通俗，他希望自己翻译的《圣经》既能够让粗通文墨的人一看即懂，又能够让精通诗文的人看来不至于低劣不雅。故而，他选择了中国经典著作的注疏和《三国演义》作为他翻译的模仿对象。他自己也说：“就文体而言，《三国演义》被认为是中国最具可读性的作品。”^[3]如此看来，马礼逊很可能是第一位有意识地以中国传统白话小说作为典范来翻译《圣经》的人，而以英语为母语的马礼逊必然不可能写出原汁原味的中文白话，他所操持的只能是欧化了的白话文。可见，所谓“欧化句法”实实在在地出现于19世纪20年代，这比郁达夫、胡适、鲁迅等人翻译西方文学作品时所使用的“欧化句法”要早一个世纪。

而后来流传十余年，再版11次的郭实腊本，其实是马礼逊本的修订本，现在看来，郭实腊本对马礼逊本的保留还是非常大的，在1919年和合本《圣经》出现之前，郭实腊本都一直是中国境内非常流行的《圣经》版本。郭实腊本所使用的语言已经非常接近于现代的白话文，同样举《马可福音》第一章前四句^①为例：

天主上帝的儿子，伊耶稣。斯耶稣合（利尔）斯托。斯基督福音的起头。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记着说：（有古卷无以赛亚三字）‘看哪，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在旷野有人喊声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照这话，伊望来了，在旷野施洗，传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

从文本上考察，无论称谓、修辞还是句法，郭实腊本《圣经》所使用的语言和现今的白话文几乎没有差别。

自19世纪初年到鸦片战争爆发，传教士们艰苦卓绝的译经努力可以视作一次前所未有的话语试验。“这一时期的《圣经》译者，为了使其译本适合于大众阅读，都尽量在保持‘古典风格’避免‘鄙俚不文’的同时，努力兼顾其易读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圣经》译本的口语化趋势日益明显。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理由将《圣经》的中译看作近代白话文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4]而到了1906年，由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eer）主持的国语和合本（Union Version）《圣经》翻译完成。国语和合本《圣经》出现之后，就成了基督教《圣经》使用方面的事实上的标准。历经

① K. F. A. Gutzlaff. 救世主耶稣新遗诏书[M]. 刻本. 新加坡竖夏书院藏版. 1836-1840? (道光十六年—道光二十年?)

八十余年，仍然广受欢迎，至今仍有人使用。

这一个长达数百年的译经工程是基督教文明与中华文明相互接触、碰撞、融合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这一话语实践所产生的产品——白话本《圣经》，在中国门户打开之后得到了广泛传播，不难想象，白话文学运动之所以一呼百应，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由基督教东传带来的，或许无意的、潜在的、但也是巨大的支持。

二、传教士的白话文创作

马礼逊等传教士的文字活动并不仅限于翻译《圣经》，1815年，由马礼逊策划、米怜担任主要编辑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Chinese Monthly Magazine)在马六甲创办，这是世界上第一个以华人为对象的中文近代报刊。在这份报刊中，不仅率先使用了西式标点符号，而且其文字也是一种“接近口语，掺杂文言而又含有外来语法的书面语言”^{[5]74}。如其序言^{[5]74-75}：

无中生有者，乃神也。神乃一，自然而然。当始神创造天地万物，此乃根本之道理。神至大，至尊，生养我们世人，故此善人无非敬畏神。但世上论神，多说错了，学者不可不察。因神在天上，而显著其荣，所以用一个天字指着神亦有之。既然万处万人，皆由神而原被造化，自然学者不可止察一地方之各物，单问一种人之风俗，乃需勤问及万事万处万种人，方可比较辨明是非真假矣……

从这一《序》可以看出，传教士们使用的中文在词汇上较为俗白；句法上既不用典也不用对仗，同时暗含英文的语法逻辑；语气上又有明显地模仿中国传统白话小说的痕迹。

而在1819年，米怜写出了第一本传教士白话小说《张远两友相论》，是为第一部以小说形式出现的传道书。《张远两友相论》流传时间极长，意义深远。据哈佛大学韩南(Patrick Hanan)教授考证，这部小说曾经被广为修订和改写，现存有至少30个以上的版本，一直到20世纪还有新版本出现^[6]。足见其流布的广泛，也让人无法低估它的影响。

另外，1833年，传教士郭实腊在广州创办杂志《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Eastern Western Monthly Magazine)。郭实腊是一个非常热衷于创作小说的传教士，其作品经常以“爱汉者”的名义发表在《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上。目前能看到的由他所撰写的以小说或准小说形式出现的传道书至少包括《大英国统志》(1834)、《赎罪之道传》(1836)、《正邪比较》(1838)、《海谟训道》(1838)、《转祸为福之法》(1838)、《生命无限》(1838)六部。在这些作品中，郭实腊广泛使用了中国白话小说的写作模式与笔法，如以“回”的形式为作品布局谋篇，更重要的是，其遣词造句已经颇具传统白话小说意味。例如《海谟训道》^①：

第一回 红颜薄命

大清年间有一个商贾，姓勤名跨，原籍苏州府，因生意冷淡，搬行上海县。此勤为人知有己而不知有人，但驰情于市利，就是朝营夕算。上有兄下无弟，夫人陈氏生三子，家和万事兴也。却说那勤跨惟利是趋，惟财是索，专务积蓄盈囊。倘稍获锱铢，就是无任欢跃。若损银钱，忿疾怨天尤人，淘气惹出事来。设使可赚钱，赴汤蹈火播弄哄骗，不顾体面。顾丑名难闻……

《海谟训道》对中国传统白话小说语言的模仿，可谓颇费心思，但在文法上仍然逻辑性较强，

① 爱汉者。海谟训道[M]. 刻本. 新加坡坚夏书院藏版, 1838(清道光十八年).

并且无法摆脱较为严整的主谓宾结构，这应该是母语思维的结果。这种西文语法和中文叙事的混合，可以视作是1917年白话文学的遥远先声。

然而，传教士们的小说创作在当时中国社会的中上层少有读者，现在也大多湮没无闻，故而极少有人把传教士们的中文小说创作与现代白话文学联系在一起，其文学成就也难以高估，但他们的首创之功，则是不可抹杀的。

上面谈及的几部作品是传教士所撰写的传道书中文学意味比较浓厚的，除此之外，另有若干使用白话、虽有小说元素，但更重讲道说理的作品，如《诚崇拜类函》（1834）、《是非略论》（1835）、《常活之道传》（1834）、《悔罪之大略》、《庙祝问答》（1882）、《小信小福》等等，这些传道书的文学意味较为淡薄，但在白话文学方面所起到的作用和前述作品是一样的。

除了创办刊物、进行中文传道书的写作，传教士们还进行了广泛的翻译活动。在文学方面，不得不提的是美国传教士宾威廉（William Chalmers Burns, 1815-1868）翻译的《天路历程》。

《天路历程》（Pilgrim's Progress）本是英国小说家约翰·班扬（John Bunyan）创作于1678年的一部宗教小说。宾威廉翻译这部作品显然是着眼于这一小说的宗教价值，内容姑且不论，其语言着实让人大吃一惊。可以看到，这部译作在白话文的操练方面已经显得非常成熟：

世间好比旷野，我在那里行走，遇着一个地方有个坑，我在坑里睡着，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人，身上的衣服，十分褴褛，站在一处，脸儿背着他的屋子，手里拿着一本书，脊梁上背着重任。又瞧见他打开书来，看了这书，身上发抖，眼中流泪，自己拦挡不住，就大放悲声喊道，“我该当怎么样才好？”他的光景，这么愁苦，回到家中，勉强挣扎着，不教老婆孩子瞧破。但是他的愁苦，渐渐儿地加添，忍不住了，就对家里的人，叹了口气说，“我的妻，我的子啊，你们和我顶亲爱的，现因重任压在我身上，我将死了。而且我的确知道我们所住的本城，将来必被天火焚毁，碰着这个灾殃，我和你们都免不了灭亡。若非预先找一条活路，就不能躲避，但不晓得有这活路没有。”他的老婆孩子听了这话，诧异得很，害怕得很，不是把他的话当做真的，是怕他要疯。

这是《天路历程》开头第一段的一小部分^{[5]87}，从文笔上看，该文已经与现代的白话文难以区分，考虑到这个译本出版于1853年，则更不能不让人惊讶。由此可见，传教士们的翻译、创作、出版活动并不是零散和断续的。这曾是一个延绵不绝的白话谱系，而且这一谱系借助于中国殖民化程度的愈加提高，一直存在和发展于遍植中国的传教系统之中。

三、基督教东传对早期白话文学倡导者的影响

基督教东传对早期白话文学倡导者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作为“白话文学”的《圣经》上。虽然在白话文学运动中，关于借鉴《圣经》白话语言的理论著述并不多见，但中国的现代作家受到《圣经》影响的旁证并不少。早在1901年-1906年求学于南京时，周作人就知道“学英文不可不看《圣书》……也在身边带着一册《新旧约全书》”^[7]。20年后的1920年，周作人在燕京大学文学会作了著名的《圣书与中国文学》讲演，其中征引了《圣经》中的三节，其中包括《何西阿书》第十四章五至六节、《雅歌》第二章十五、《启示录》第十七章七至八，将周作人的引文与1919年的和合本《圣经》相对照，字句分毫不差，可见《圣经》对这位新文学奠基人的直接影响。他甚至还说：“（《圣经》）白话的译本实在很好，在文学上也有很大的价值；我们虽然不能决定怎样是最好，指定一种尽美的模范，但可以说在现今是少见的好的白话文……原作的文学趣味保存的很多，

所以也使译文的文学价值增高了。”^{[8]42}而新文学的大将鲁迅在其“早期作品中，就有诸如‘亚当之故家’、‘弥尔之乐园’、‘神赫斯怒，湮以洪水’、‘撒旦’等不少《圣经》的内容和词语”^[9]。在1919年，曾经直接提到“《马太福音》是好书，很应该看”^[10]。而在其写于1925年的《复仇(二)》之中，更是通篇改写基督被钉上十字架的故事，可见鲁迅的创作也受过《圣经》影响。周氏兄弟是在白话文学发轫时期在理论和创作两方面都做出了杰出贡献的创作者，而白话文学运动的直接发起人胡适是不是也受到过基督教东传的影响呢？答案也是肯定的。

1933年，胡适在回顾白话文运动的缘起时，提到在1915年，“我不能不想到那时清华学生监督处的一个怪人。这人名叫钟文鳌，他是一个基督徒，受了传教士和青年会的很大影响……他做了一些宣传品”，而其中一条就是“废除汉字，取用字母”，胡适由于讨厌钟文鳌的传单，就写了封信去骂他，但后来又懊悔自己的草率，才开始研究“中国文字的问题”。很快，胡适就“已经承认白话是活文字，古文是半死的文字”^[11]，奠定了日后发起白话文运动的基础。而到了1916年，胡适已经写出一首千余字的白话诗了，在写于1935年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言》中，他提到“基督教的传教士早已在各地造出各种方言字母来拼读各地的土话，并且用土话字母来翻译新约，来传播教义了”^[12]。

为了学习和掌握中文，达到传教的目的，以语音为中心的传教士们一直试图通过拼音化的途径来攻克中文。而基于现实需要，他们又必然会选择和创造易于为人接受的、较为俗白的语言，其话语实践则贯穿于《圣经》的翻译和传道小说的写作之中。而正是这些话语实践成为了中国现代白话文学的先声。无怪乎周作人在反思白话文学的发生时感叹：“我记得从前有人反对新文学，说这些文章并不能算新，因为都是从《马太福音》出来的；当时觉得他的话很是可笑，现在想起来反要佩服他的先觉：《马太福音》的确是中国最早的欧化的文学的国语，我又预计他与中国新文学的前途有极大极深的关系。”^{[8]43}事实也正是如此，作为基督教东传结晶的《圣经》对中国的新文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几乎所有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人物，如鲁迅、郁达夫、郭沫若、曹禺、许地山、林语堂、田汉、成仿吾、冰心、闻一多等，都在自己的著作中使用了《圣经》的语言、典故，或对其进行介绍与评述。而其中有些作家如郁达夫、郭沫若、巴金、曹禺等多次提到自己的创作受到了《圣经》的指引^[13]，可见其影响力的深刻与持久。作为白话文学的来源之一，基督教东传的作用是巨大而明显的，应该受到人们的关注与重视。如果说对文学的分析可以从语言、观念、制度三个层次加以分析，那么在中国新文学研究领域，至少在语言方面，对基督教东传的研究不应该被遮蔽。而从更加宽宏的角度来看，基督教东传又提供了很多制度上的新要素，如报刊制度、杂志制度。这直接开启了一种新的印刷文化，无论对中国的新文学还是中国的现代化，都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 [1] 胡适. 白话文学史[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 7
- [2] 佚名. 新旧约全书[M]. 南京: 中国基督教协会, 1994: 38.
- [3] 谭树林. 论马礼逊《圣经》汉译及其影响[J].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0, (5): 60-64.
- [4] 吴义雄. 在宗教与世俗之间: 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南沿海的早期活动研究[M]. 广州: 广东教育出版社, 2000: 391.
- [5] 袁进. 中国文学的近代变革[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 [6] Patrick H. The Missionary Novels of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J].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2000, (2): 413-443.
- [7] 周作人. 知堂回想录[M].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2: 451.
- [8] 周作人. 艺术与生活[M].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3.
- [9] 郑欣淼. 鲁迅与宗教文化[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333.
- [10] 鲁迅. 鲁迅全集: 第8卷[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8: 89.
- [11] 胡适. 逼上梁山[C] // 胡适. 中国新文学大系: 建设理论集. 影印本.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3: 3-18.
- [12] 胡适. 胡适文集: 第1卷[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111.
- [13] 梁工. 基督教文学[M]. 北京: 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1: 403-432.

The East-spreading of Christianity

—— One of the Sources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LI Dan¹, ZHANG Xiuning²

(1. Jiangsu Polytechnic University, Changzhou, China 213164; 2. College of Humanitie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China 310028)

Abstract: The East-spreading of Christianity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sources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To meet the primary need of the promotion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 the missionaries had to translate Bible into Chinese, publish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and write novels and brochures in Modern China in the early 19th. Thus, the translating of Bible and the writing of missionary novels are regarded as the origin of the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Movement. A series of practices greatly influenced the birth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Key words: Christianity;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Bible

(编辑: 刘慧青)